

道家文化的现代意义

唐明邦 何建明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离不开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深入研究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科学性和民主性精华,乃当今广大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包涵着江汉、河洛、海岱等不同的地域文化,儒、道、墨、法等不同的学派文化。绵延至今的文化传统,不言而喻乃是各种文化百川归海的大交汇。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充分显示了古文化的蓬勃生机。秦汉以后,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中国文化呈现新的局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均融摄诸家而别开生面,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以其长于经世务实精神而显扬于世,道家则以其玄虚旷达而为人钟爱。长期以来,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对立互补的特殊结构。构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不同乐章的儒道文化,从来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佛教文化传入后,通过儒道互补结构对它的认同与涵化,后期封建社会呈现以儒道为主兼容释家的文化新形态。近些年来,某些学者单纯以儒家文化代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虽称儒道互补,实际上树儒家文化为正宗,贬道家文化为陪衬。此类观点违背中国文化思想史的客观实际,且有悖于鲁迅先生关于“中国根柢全在道教”^①的名言。事实上,正如国际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所说:“中国人的特性中,很多最吸引人的地方,都来自道家传统。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象大树没有根一样。道家在中国文化中至今还是生气蓬勃的。”^②

在扬儒抑道的学术研究偏向影响下,儒家文化的研究,长期成为热点,关于儒家文化的历史地位和现代意义,海内外则多有论述;与此相反,道家文化的合理层面及其现代意义的研究,则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深入开展道家(道教)文化思想的研讨,不仅有利于克服传统文化研讨中的偏颇,有助于全面把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尤其有利于重新评估道家文化的现代意义,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一、“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③,是道家的中心思想。“道”是什么?诸子百家,言人人殊。儒道二家的观点,大相径庭。儒家视“道”为人伦之至理,治国之大经,尧舜周孔一脉相承,万世不变。道家则把“自然之道”作为思想体系的核心。认为“道”无形无象,自本自根,它是宇宙演生之本源,人和万物变化之根基。同儒家仅注视社会人伦不同,道家注重通观人物,玄思宇宙、洞见本根。这一致思倾向,对于锻炼和提高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能力,卓有成效。无论是先秦道家,两汉黄老之学,魏晋玄学或是两宋以来道教理论诸流派,都堪与世界各民族的思辨哲

学相媲美；至于道家(道教)思想对各个文化领域的渗入以及在哲学领域所整合形成的宋明理学和心学，显示了中国古代的理论智慧。

在今天，弘扬道家哲学思维传统，更有利于吸收、消化各种高度理论化的世界哲学思潮，构建足以体现中国理论智慧的当代中国哲学。

道家认为，“道”不只是宇宙之本体，还是自然界运动变化的规律。道家十分强调热爱自然，尊重客观自然规律，诱导人们去探索自然和生命的奥秘。这一思想，极大地影响古代中国人的自然观及生命观，成为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中国古代的许多科学技术成就，都应归功于道家。不少著名科学家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都是道家人物。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公允地说：中国的道家对自然界“所持的态度，从本质上是科学的”（灌耕编译《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第87页）这是西方学者对“道法自然”原则的正确评价。

二、“反者道之动”

道家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存在、变化和发展，无不以其对立面的存在、变化和发展为前提；矛盾双方所处的地位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总在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由此，他们特别强调与“正”的肯定方面相对应的“反”的否定方面的重要性，把它看作推动事物向前发展的最重要力量；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是遵循矛盾双方相反相成、相互转化的规律进行的。道家对自然本质的洞察，深刻地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辩证法则，体现了道家文化的高度的辩证智慧。

“反者道之动”^④是“道”的本质特征。这一特征是儒家和法家经验比类的致思方式所不能得到的。道家认为，“道可道，非常道”^⑤。作为宇宙本真的“道”，是无形无象的，永恒、绝对的，非感官所能把握；只有排除一切私欲邪念的蛊惑和感觉经验的成见，通过“静观”“玄览”静默内视方法，才能把握“常道”。这种认识方法，区别于佛教提倡的神秘主义体验论（“证悟”论），是一种执着追求自然之“道”的理性直觉主义。这种理性直觉主义虽然因缺乏科学分析方法而不能十分有效地揭示自然的奥秘，但它确能获得一些深刻的科学洞察。所以李约瑟博士认为，“在中国古代十分清楚的是，儒家的伦理学的唯理论是与科学的发展不相容的，而道家的经验主义神秘论则对科学有利。”^⑥特别是经过现代科学理论和科学实践对道家探秘者们所提出的“从反面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从阴阳两极的对立统一把握自然变化的本性”等观点的证实，道家所注重的直觉认识方法，为现代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如爱因斯坦、彭加勒、波普等所肯定，它是现代物理学研究中的重要致思方式之一，并被誉为最具魅力和自由创造力的现代思维方式。

“反者道之动”的思想原则，也显示出对异端思想所采取的宽容精神。

同儒家“攻乎异端”^⑦的正统立场和“罢黜百家”的独断学风相反，道家从对立统一原则出发，积极提倡“绝圣去智”^⑧，否定圣贤权威，反对囿于一家之见，要求坚持“以此明彼，以彼明此”^⑨、“反复相明”的认识原则，以开放的心态容纳、涵摄不同的学术观点。如黄老道家能“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⑩。道家对多元学术所采取的这种宽容态度，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方针的历史表现。

三、“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与儒家“德治”思想和法家的“法治”主张不同，道家提倡“无为而治”的政治原则。

“无为而无不为”^⑬是“道法自然”思想的逻辑引申。“法自然”，就是任其自然，顺其自然，反对矫揉造作和为所欲为。提倡“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这是说统治者无为而国治、国家无为而太平和人类无为而长存。

道家认为，专制统治之所以不能长久，因其统治者“服文采、带利剑”、贪欲膨胀，鱼肉人民。以致民众深受剥削压迫，饥不保食，寒不保暖，终于“民不畏死”，^⑭挺而走险。好的统治者应掌握“无为而治”的领导艺术，善于因势利导，“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圣人不巧，时变是守”。^⑮以“爱民治国”^⑯为己任，“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⑰要薄税敛、轻刑罚、尚节俭，“治大国若烹小鲜”，^⑱谨慎理政而不妄为，政治清明而人民归顺。道家的这一思想告诉我们，治理社会应当“以百姓心为心”，“损有余以补不足”，“去甚，去奢，去泰”；^⑲应当“为无为”，而不要瞎指挥；应当“知常”，“不知常，妄作，凶”。^⑳在封建社会里，若对小农经济妄加折腾，必然导致社会的动乱不安。“法令滋章，盗贼多有”，^㉑“民多利器，国家滋昏”。^㉒反对一切破坏社会和平的侵略战争，“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㉓“大军之后，必有凶年”。^㉔肯定为维护和平而采取反侵略战争的必要性，“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㉕当今世界和平不断地遭受到种族歧视、资源争夺，民族争端和争夺世界霸权等多种因素的威胁和破坏的时候，重新领会道家文化的和平思想，定能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无为而治”的原则亦很重要。如果说儒家以其自强不息的男性品格，要求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其特点在“制天命而用之”。^㉖那么，道家则以其柔顺和谐的女性品格，要求无为而顺应自然，复归于自然，从而与自然合一。道家认为，自然宇宙与人类自身是一个和谐的有机统一体。人体不过是相对于自然界这个大宇宙而言的小宇宙。甚至警觉到天地、万物和人三者相互为“盗”充满着斗争或“杀机”，因而积极主张“橐其宜则吉”。^㉗人只有处在一个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心理环境相协调的统一的无为状态之中才能获得正常的生存。因此，他们坚决主张人类应当无为而顺应自然，而不可侵害自然、破坏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人类愈能自觉地“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㉘就愈能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获得持久的生存。道家的这一思想，日益为近代因片面追求征服自然所带来的空前生态危机所证实。人类因科学技术发达对自然无止境的反叛、到头来反为自身发掘了陷阱。现代人类只有采取新型的发展模式，才能真正地避免走向毁灭自身的生态危机。这正是道家文化中顺应自然的思想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四、“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道家按照“尊道贵德”^㉙的原则，建立自己的道德价值观，与儒家的伦理本位主义迥然相异。儒家强调人人必须遵守三纲五常，用封建统治思想约束人心；道家以猛烈地抨击儒家纲常名教的异端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以其自然之“道”，同儒家的人伦之“礼”尖锐对立。明确提出“大道废，有仁义”，^㉚“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㉛严厉抨击儒家的伪道德，假名教。强调道德与个人之自觉。积极主张德性之自然，和真道德、真名教。认为修身养德、

莫大于“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③⑩}鄙弃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损人利己行为。强调清心寡欲，淡泊功名，宁静致远，大公无私，“利而不害”。^{③⑪}主张虚怀若谷，归真返朴，慈让天下。

道家非常重视永葆人的自然本性。主张“含德之厚，比于赤子。”^{③⑫}有道之人当不失其“赤子之心”。坚决否定儒家伦理对人的异化。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品德高尚，度量宽宏，不为世俗名利所引诱的高洁道家形象。他们出则为救世度人的救世者、隐则为天性得全的活神仙。其仙风道骨颇为士林所敬重。处在当今各种道德价值观念激烈冲撞的改革开放时期，继承和发扬道家纯朴的道德观念，对于抵制和防范利己主义道德观的侵蚀，树立艰苦朴素、任劳任怨、忘我工作的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念，无疑是有益的。

就个性之自然而言，同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和佛家超尘绝俗的出世思想相反，道家追求在世而不入俗、出尘而不离尘的理想人格。道家以博大的气魄和放达的胸怀，观察宇宙，反省人生；畅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天”。（《庄子·齐物论》）傲视儒家所执着的功名利禄，无累于佛家所烦恼的生死苦海，积极追求今生今世的自由逍遥和长生久视。时弥远而思弥永。人类文明的有限，融进了宇宙的无限；而宇宙自然的无限，又融进了现世人生的有限之中，这就是与儒家的贤人作风相对应的道家的智者气象。这种恢宏的气象和对个体人格尊严与自由个性的高扬，体现了道家对人伦社会的批判精神和对人生价值的独特理解。今天，当“否定一切”的民族虚无主义、全盘西化的空想主义甚嚣尘上之时，道家不追求虚幻的未来，不沉湎于已往的过去，立足现世，放眼环宇，其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很值得批判地继承。

同自然主义的人生理想相一致，道家同儒家提倡“文以载道”“画助人伦”的伦理主义审美观相反，追求超功利的、自然主义的审美情趣，积极肯定自然的质朴、恬澹、淳真，睥睨愉悦感官的华饰与雕琢，确信“素朴而天下莫与之争美”，^{③⑬}“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③⑭}赞颂“自然之美”，极力追求将人生融化于自然而与天道合一的审美人生境界。道家的这种审美情趣给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以极大的影响，哺育了诸如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汤显祖等大批文学艺术巨匠。当今之世，道家所执意追求的朴素、纯真、淡泊的自然之美，日益为人们所喜爱和追寻，居处环境的园林化，自然风景区的开发，街心公园的设置，无不显示道家审美情趣的现实意义。

五、“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道家对自然的热爱，集中地表现于对人的生命的珍视。高度肯定生命的价值。把生命的存在与延续，看作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理所当然的维护。鄙视“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的不良行径。极力追求“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③⑮}主张“我命在我不在天”，^{③⑯}认为通过服食、导引、内丹等养生之术，可以延寿益年，坚决否定儒家宣扬的“死生有命”的唯心主义宿命论。道家的理想主义生命观，激发着人们锲而不舍地探索生命的奥秘和养生的妙术，促进了中国独具特色的道术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这种包括内丹、外丹、房中、存思、胎息、辟谷、导引等内容的道术科学，成为古代化学、冶炼学（炼丹术）、人体科学（气功养生学），医药学和心理学等科学技术的主要内容，产生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家，为华夏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了不朽贡献。在今天，受道家文化滋养的气功学、养生学和医药学，正在同现代科学紧密结合。这种结合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独特意义，正如钱学森同志所断言的，这一结合，“必将导

致爆发一次科学革命”。^⑦

道家文化毕竟产生于奴隶制统治下的春秋时期，发展于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难免带有历史局限性。诸如提倡非功利主义的道德价值观，片面追求长生久视，幻想个体精神的绝对自由和隐居避世，以及“不敢为天下先”的退守心理；此外，“道家学者虽然对大自然特别爱好，但并不信任理性与逻辑”^⑧等等。道家文化中的这些不合理的、消极的层面，应当坚决地加以科学地扬弃。

道家文化是中华民族贡献于全人类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通过“汉学东渡”和“中学西传”，还成为东亚和欧洲许多国家和民族文明发展的宝贵营养。在道家思想促进下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对世界文明史作出独特的贡献。正如李约瑟博士所说的：“倘若没有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优越贡献，我们西方文明的整个过程将不可能实现”。^⑨在今天“东方文化回归热”的浪潮中，道家（道教）文化思想正在同现代科学文明相结合，越来越显示出特殊的世界意义。我们相信，随着全球性的东方文化研究热潮的深入开展，中华民族的道家文化定将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注释

① 《致许寿裳》，载《鲁迅全集》卷九，第285页。

② 《李约瑟文集》第255页。

③④⑤⑧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 《老子》第25、40、1、19、37、74、10、57、60、29、16、57、57、46、30、67、64、51、18、38、67、81、55、59章。

⑥ 《李约瑟文集》第43页。

⑦ 《论语·为政篇》

⑧ 王弼：《庄子注》

⑩⑬ 《史记·太史公自序》

㉔ 《荀子·天论》

㉕ 《阴符经》

③④ 《庄子·天道》《庄子·刻意》

㉖ 《抱朴子·黄白》

⑦ 《光明日报》1986年5月12日。

⑧⑨ 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台湾中译本第2册第489页；第3册第368页。

（本文责任编辑 涂赞琥）

（上接124页）

该书中找到其最初的根源。

本书忠于史实，褒贬适当。作者对国民革命军及其主要将领均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进行评述。如：既充分肯定它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战斗中的功绩，又区别了各军在战争中作出的不同贡献。既指明了绝大多数将领卷入反共潮流而导致国民革命军的变质，又区别了他们之中某些人犹疑动摇的不同态度。

该书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的系统性和开拓性，正因为如此，也难免会有一些疏漏和不准确之处。如：对国民革命军主要将领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阐述得不够全面和具体；关于唐生智在北伐期间反对农民运动思想的分析还缺乏事实为依据；谭延闿所率领的建国军并非在1923年谭赵（恒惕）战争后依附孙中山的，而谭是奉孙中山之命入湘讨赵并被委任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尽管该书有某些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该书的出版填补了史学研究的一项空白，对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将起到促进作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